

第一章 绪论

一、邓小平战略思想

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直到 1997 年离开我们。他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同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是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综观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战略问题，善于进行战略思维。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明战略的重要。他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他说，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工作中的各种事情，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从作为方面军、战略区的领导，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再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观察形势，考虑问题，对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战略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工作中总是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大局，善于统筹兼顾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并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以非凡的战略勇气开拓新的局面，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韬伟略。每当面临重大的历史事件、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全局在胸，处变不惊，坚持原则，绵里藏针，为争取战略的主动和全局的胜利，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计荣辱，鞠躬尽瘁，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风范胸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总揽全局，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继承发展毛泽东战略思想，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构筑了形式和内容独具特色的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

从形式上看，邓小平在分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时，运用了战略学的诸多范畴，构成了完整的范畴体系。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并不限于军事领域，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重点关注军事领域的同时，也对党政工作中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性意见。建国以后，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从革命战争转向国家建设，他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考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将战略概念和战略学的一系列范畴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显示出其深厚的战略理论素养。当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战略高度考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时，就战略概念而言，他讲到了全球战略^①、国际战略^②、发展战略^③，当然就内容而言也讲到了军事战略即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以及其他战略

① 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53 页。

② 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34 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67 页。

问题；而他在筹划这些战略问题时又运用了战略决策^①、战略设想^②、战略规划^③、战略目标^④、战略方针、战略重点^⑤、战略布局^⑦、战略措施^⑧等一系列范畴，构成了纵横交织的范畴体系。

从内容上看，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和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战略判断为前提，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思想，并分别就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祖国统一、国防与军队建设，还有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战略思考，从总体上以及各个分支上构思了其战略思路、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勾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发展中继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关于中国革命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8、339、340、341、403 页。

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4 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2 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1、305、307 页。

⑤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5—276 页。

⑥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17 页。

⑦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 页。

⑧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1 页；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5—276 页。

和建设的一系列战略观点，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酝酿和准备。这一战略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实践，使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本书以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体系为主要研究内容。

二、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邓小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进程中，起初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面军、战略区的领导，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形成了独到的战略见解，锤炼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显示了卓越的战略才干，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后期，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总结国际国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相结合，继承发展毛泽东战略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给予了系统的初步回答，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体系，开拓了中国共

产党战略思想的新境界，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著作、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就前、后期战略思想的关系而言，邓小平前期战略思想是后期战略思想的酝酿和准备，后期战略思想是对前期战略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追溯邓小平前期战略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 1927 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坚定地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29 年赴广西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红七、红八军和右江、左江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军队和战略区的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分析形势高屋建瓴，考虑问题高瞻远瞩，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党政军工作中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斗争中，为争取战略的主动和全局的胜利，他总是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8 年 1 月，任八路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撰写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这篇文章。当时，正是抗日战争中敌人战略进攻、我方战略防御的时期。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抗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邓小平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

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①邓小平在文章中还对运用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②。这是邓小平以战略眼光，着眼于持久抗战来分析形势、考虑问题的一个范例。

其后，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在这个时期，他坚决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和指示，在重视军事斗争的同时，强调“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③。军事上，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同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他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做准备的方针。1943年1月26日，他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其中讲到：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①邓小平要求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要树立起这样的观念：一是要有长期的战略打算，在抗战中就要准备战后的问题，在有坚持敌后抗战与取得胜利的明确观念的同时，还要树立起巩固战后在华北阵地的明确观念，考虑到战后的建国；二是要有全局观念，一切言论行动、政策决定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同志一起，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领大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 20 万人，斗争极端艰苦。面对困难，邓小平的态度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②。当时，刘邓大军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 160 多个旅中的 90 个旅的兵力。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跃进中原的胜利形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4 页。

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指出“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①。他提出，要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看形势，而不能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他说，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但希望胜利还要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②。在这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服从大局的博大胸襟和敢于胜利的战略勇气。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随后，在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邓小平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这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然后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9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大陆的解放。

江泽民同志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率军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

第二阶段，是建国后头 17 年。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在军事领域，但同时也从战略高度对党政工作中事关全局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那么，建国以后，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则从军事领域转向全面的国家建设。他在进军西南之前，即请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公安、新闻、财经、广播、邮电等专业干部，并在刚解放的宁沪杭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部队进入大西南，以适应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进入西南以后，他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将统一战线工作提到建设时期战略的高度，指出统战工作不仅是我们的夺取政权的法宝，夺取政权以后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统战工作在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他在工作中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变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建成渝铁路等，由此迅速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1952年7月，邓小平从西南调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

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强调部门工作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他指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1955年4月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10年，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略问题作了全面思考。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针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以来的“左”的错误，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在如何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这个问题上，他提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他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3页。

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即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化，健全党的民主生活；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尤其可贵的是，1960年，他针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要正确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①。

第三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战略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但他时刻关心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当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被粉碎后，邓小平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回顾这段工作，邓小平说：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①但是整顿的业绩和邓小平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发展进入了后期，即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是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基本思路的时期。其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意义的，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前提，也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灵魂。十一届三中全会还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随后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后来在十三大得到完整表述。这条基本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强调，一定要把正确的政治路线贯彻下去，决不动摇。邓小平还指出，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组织路线问题涉及许多方面，邓小平指出当时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把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党性强的同志选上来接班。这一时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际就是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灵魂，以正确的组织路线为保障，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围绕着这个基本思路，他以伟大战略家的胆识和勇气，对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判断。重要的如：

国际形势。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过去，我们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邓小平根据世界情况的变化，1980年1月提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不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

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他说：“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

国情。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过去，我们对国情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②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980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要充分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③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方向。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④1980年4月，他再次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⑤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四个现代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 20 世纪末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对这个目标的理解，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是只限于这四个方面？二是这个目标的标准是怎样的？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这个奋斗目标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① 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又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② 他在 1979 年 12 月 6 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③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9-9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7 页。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延伸到了21世纪。他指出：“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①

市场经济。这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②

党的建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基本思路的逐步形成，以及一系列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的新认识、新判断的提出，一条新的道路已经逐步展现出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已经开辟。

第二阶段，从十二大以后到十三大。这是邓小平在领导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4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